

## 后出版本的书籍史价值谏论——以清雍正三年陈唐活字印本《后山居士诗集》为例

□ 王俊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陈师道（1053—1102），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江西诗派“三宗”之一。陈师道集的成书时期正处于抄本时代向印本时代过渡的阶段，进入印本时代，书籍编刊条件逐步完善，出版业发展渐趋成熟，陈师道集在后世亦随之不断衍生、异变，形成极为复杂的版本谱系和多样化的书籍面貌。

本文以陈师道集早期编纂情况回溯与陈师道诗注版本源流梳理为背景，讨论清雍正三年（1725）陈唐以活字刊行的《后山居士诗集》的文本面貌与版本价值，特别是其在经典与创新之中力求平衡的编纂意图，展示出这部成书较晚的陈师道诗集作为后出版本试图打破宋元以来“后山诗注”范式的努力，并由此入手探讨陈师道集传世过程中所呈现的版本系统之间交叉衍生的复合样态及书籍史视角下的后出版本的价值。

### 一、陈师道集的早期编纂及刊行情况

陈师道集已知最早的编纂者是他的门人魏衍。政和五年（1115）魏衍作《彭城陈先生集记》云：“先生既歿，其子丰登以全稿授衍，亲录藏于家者今十三年……受其所遗甲、乙、丙稿，皆先生亲笔。合而校之，得古律诗四百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诗曰五七，杂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类。”<sup>①</sup>据此可知，陈师道生前就曾对自己的作品有意识地进行筛选、编纂，“小不逮意则弃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从而形成了陈师道亲自校订的“甲、乙、丙稿”。遗稿后由其子转授魏衍，魏衍“合而校之”，有诗465篇，文140篇，共605篇，并厘为诗六卷、文十四卷，次皆从旧，形成了诗文集二十卷目录一卷的面貌。

此外，魏衍还提到：“今贤士大夫竞收藏之，则其传也悉待于衍耶。后岂不有得手写故本以证其误者，则不肖之名因附兹以不朽为幸焉。其阙方求而补诸，又有《解洪范相表》《阐微》《彰善》《诗话》《丛谈》，各自为集云。”可见当时除了魏衍直接继承自陈师道亲定甲、乙、丙稿而形成的这个二十卷本之外，还有其他的陈师道作品集行世，且既有抄本也有刻本。

检宋以来书目，《通志·艺文略》著录《后山陈无己集》十五卷；《郡斋读书志》著录陈无己《后山集》二十卷，赵希弁《附志》称：“《后山先生文集》五十五卷。右陈师道无己之文也。《读书志》云二十卷。希弁所藏乃绍兴二年（1132）谢克家所叙者。或谓二十卷者乃魏衍所编，而《读书志》不载。”<sup>②</sup>则赵氏藏有谢克家序五十五卷本，并指出《读书志》所著录的二十卷本乃魏衍二十卷本之外的另一个版本。《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云：“《后山集》

<sup>①</sup>〔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中华书局，1995年，卷首，第16—17页。

<sup>②</sup>〔宋〕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190页。

十四卷、《外集》六卷、《谈丛》六卷、《理究》一卷、《诗话》一卷、《长短句》二卷。秘书省正字彭城陈师道无己撰，一字履常。蜀本但有诗文，合二十卷。案：魏衍作《集记》，云：“离诗为六卷，类文为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遗甲、乙、丙稿”，“诗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刘孝黈刊于临川，云未见魏全本，仍其旧十四卷为正集，盖不知其所谓十四卷者，止于文而诗不与也。《外集》诗二百余篇、文三篇，皆正集所无。《谈丛》《诗话》，或谓非后山作。后山者，其自号也。”<sup>①</sup>则又有临川本、蜀本、四明本。此外，《直斋书录解题》卷二〇：“《后山集》六卷、《外集》五卷（一作三卷）。”卷二十一：“《后山词》一卷，为长沙坊刻《百家词》本。”<sup>②</sup>《宋史·艺文志》别集类著录《陈师道集》十四卷，《语业》一卷<sup>③</sup>。

以上提到的陈师道集早期版本有魏衍二十卷本、魏衍本之外的另一种二十卷本、十五卷本《后山陈无己集》、五十五卷谢克家序本、蜀本、四明本、十四卷文集本、三十卷刘孝黈刊临川本及其他选本、词等单独行世的作品集<sup>④</sup>。可见，在陈师道集编纂的早期阶段，众多的版本呈现出形态各异的卷次与篇目。早期版本因缺乏实物留存，难以直接验证其文本间关系，但诸家书目所载足以说明其不稳定的状态，正是这一特点为其后的篇目增益及版本衍生提供了大量的空间。

## 二、陈师道诗注本系统与版本流变

陈师道集在后世的版本衍生有全集本和诗注本两个系统。大致而言，全集系统有宋蜀刻本《后山居士文集》二十卷、以明弘治十二年（1499）马暉刻本《后山先生集》为源头的三十卷本和以清雍正八年（1730）赵骏烈刻本《后山先生集》为源头的二十四卷本。

陈师道诗注本系统发轫于任渊注陈师道诗，政和元年（1111）任氏撰《黄陈诗注序》：“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岩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暇日因取二家之诗，略注其一二。第恨寡陋，弗详其秘。姑藏于家，以待后之君子有同好者，相与广之。”<sup>⑤</sup>今所见《后山诗注》前有未署时间的任渊跋，其跋云：“……近时刊本，参错谬误，政和中，王云子飞得后山门人魏衍亲授本，编次有序，岁月可考，今悉据依，略加绪正，诗止六卷，益以注，卷各厘为上

<sup>①</sup>〔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09页。

<sup>②</sup>〔宋〕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第592页。

<sup>③</sup>〔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八，中华书局，1977年，第5369页。

<sup>④</sup>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十二《后山居士集》以卷帙多寡总结了陈师道集的早期版本情况，可供参考：  
1.《后山先生文集》五十五卷（《读书附志》）；2.《后山集》二十卷（《读书志》《通考》）；3.《后山陈无己集》十五卷（《通志·艺文略》）；4.《后山集》十四卷（《解题》《宋志》）；5.《外集》六卷（《解题》，临川本）；6.《后山集》六卷（《解题》，诗派本）；7.《外集》五卷（或三卷。《解题》，诗派本）；8.甲乙丙稿（《解题》，四明本）；9.《长短句》二卷（《解题》）；10.《后山词》一卷（《解题》）；11.《语业》一卷（《宋志》，疑亦词集）。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第589—590页。

<sup>⑤</sup> 任渊及下文许尹的《黄陈诗注序》仅见于义宁陈氏光绪二十六年（1900）覆刻的《山谷诗集注》的卷首。见《后山诗注补笺》，第591—592页。

下，作之有谓而存之可传，无怪夫诗之少也。”<sup>①</sup>据此可知，任渊早年曾注有黄庭坚、陈师道二家之诗，但只是藏于家中，没有刊布。政和中，任渊选择了当时可见的各种刊本中最善的魏衍本为底本，重新整理注解，分为六卷，每卷又厘为上下。又绍兴二十五年（1155）许尹撰有《黄陈诗注序》云：“三江任君子渊，博极群书，尚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诗为之注解，且为原本立意始末，以晓学者，非若世之笺训，但能标题出处而已也。既成，以授仆，欲以言冠其首。”<sup>②</sup>则任渊所编注的六卷《后山诗注》至此得以刊刻。任渊注陈师道诗以魏衍本为工作底本，故虽然收录诗歌数量较陈师道全集本系统而少，但从文本来源上看，是更为接近魏衍本之旧貌的。

今存最早的《后山诗注》为宋绍兴间蜀刻本，存7册，为卷三下到卷六下，今藏国家图书馆。虽为残帙，但其分卷符合“诗止六卷，益以注，卷各厘为上下”的表述，是目前唯一保存任渊注原始面貌的版本。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黄丕烈旧藏宋刻残本《后山诗注》，存第六卷，共32叶。傅增湘《宋刊残本后山诗注跋》对比宋蜀刻残本与黄丕烈旧藏残本，认为虽然版式行格相同，但前者为蜀中初刻，后者出于覆刊<sup>③</sup>。又日本内阁文库藏有《后山诗注》十二卷，与黄丕烈旧藏残本为同版。不同于全集本无元刻存世的情况，《后山诗注》元刻本至今有藏，如袁克文旧藏元刻《后山诗注》十二卷<sup>④</sup>、日本内阁文库藏《后山诗注》十二卷等。明刻《后山诗注》以弘治九年（1496）袁宏刻十二卷本最为重要，其后的明嘉靖十年（1531）辽藩朱宠灏梅南书屋刻本、朝鲜活字本、日本元禄三年（1690）活字本都是以袁宏刻本为底本的。

任渊《后山诗注》的成书将陈师道集的版本分流成了无注的全集本和有注的诗集本两大系统，虽然诗注本在作品完整性与篇目体量上不如全集本，但其后世衍生的版本数量却多于全集本系统。究其原因，一方面，陈师道以诗歌成就称名，作为影响深广的江西诗派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黄庭坚，自然后世对其诗歌创作的关注更多；另一方面，任渊注后山诗于两宋之交，距陈师道生活的年代尚未远，佚文遗踪多可征考，其注解兼顾诗句典故和生平交游，是宋人注宋诗的典范，尤为后人所重视。任渊《后山诗注》及宋以来诗注本系统的众多版本与陈师道全集本系统诸书形成了方骖并路的两条陈师道作品文本传承脉络。

### 三、回归经典与别出机杼：后出版本的生存方式

明清时期，陈师道诗集基本延续宋元以来确立的任渊《后山诗注》之范式，以明袁宏刻本及其衍生本为主流，但清代还出现了一部无注的陈师道诗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一局面，即雍正三年陈唐活字印本《后山居士诗集》。

<sup>①</sup> 《后山诗注补笺》，目录，第1页。

<sup>②</sup> 《后山诗注补笺》，第592—593页。

<sup>③</sup>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00页。

<sup>④</sup> 此本有袁克文跋，称其为宋刻，在《宋集珍本丛刊》中亦著录为宋刻本，实为元刻。与宋蜀刻残本对比，细观其行款，宋蜀刻本的诗题低三格，注文低两格，左右双边；袁克文跋本低五格，注文低一格，四周单边，双顺鱼尾。

陈唐，字希冯，又字云川，号青芝山人，清康熙间浙江嘉善人，生于书香世家，因其出自遗腹，为追念父亲，终身布素，奉母至孝。陈唐少时即绝意科举，专心古学，工诗文，多藏书，遍览经籍，尤喜学易，性好山水，悠然其间，著有《青芝山人集》<sup>①</sup>。陈唐于雍正三年以活字刊行《后山居士诗集》六卷《逸诗》五卷《诗余》一卷。此书半叶9行21字，黑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书前有雍正三年吴淳还《重订后山先生诗集序》，并附政和六年王云跋、政和五年魏衍序及《宋史》陈师道本传。卷端题“后山居士诗集卷一”，次行署名“门人魏衍编”，卷一至卷六收录各体诗歌共462首。又《逸诗》五卷，首列目录，卷端题“后山先生逸诗卷一”，次行署名“后学陈唐编”，卷一收录五言古诗四十首，卷二收录七言古诗一十三首，卷三收录五言律诗五十九首，卷四收录七言律诗五十一首，卷五收录五言绝句八首、七言绝句四十三首。又《诗余》一卷，卷端题“后山先生诗余卷全”，次行署名“后学陈唐编”，收录词作四十二首。此书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多家机构有藏。

据吴淳还《重订后山先生诗集序》云：“余同里陈子云川，年少负隼才，苦爱后山先生诗，合诸镌本，反复参考，补遗辑漏，排纂先后，兼订天天，近付汗青，属序于余。……集今共十二卷，前六卷，当时门人魏衍所编，仍其旧。后五卷暨诗余一卷，则云川遍搜他本，补所未备者也。蜀人任渊于前六卷故有注，兹置不以入者，涪翁尝论少陵诗云：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至任注即不至穿凿如注杜诸家，然世有善读者当自能得之，可无事郑笺为耳……”<sup>②</sup>，则陈唐之所以将卷次整合前六卷、后五卷暨诗余一卷，是为了在前六卷中恢复魏衍所编二十卷本中所包含的诗六卷的原貌，亦即任渊注“诗止六卷”的原貌，且认为善读者无需注释自能得之，故不采用任注，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无注本的诗集，而陈唐“遍搜他本，补所未备”的部分则编入后五卷《逸诗》和《诗余》一卷。此外，在书前序跋部分，陈唐还改变了先魏衍序、后王云跋的形态，将王云跋独立出来，命名为“后山先生诗集题辞”，又将陈师道宋史本传附于书前。

陈唐编刊《后山居士诗集》时，距陈师道集最初编纂成书已有六百余年。作为一部后出的新编陈师道诗集，陈唐有意摆脱任渊注本强力影响下的后山诗的典型书籍范式，试图通过诗分六卷的形式回溯至比任渊注本更早的魏衍所编陈师道集，其本质是通过回归“经典”以突破另一个“经典”的桎梏从而实现书籍面貌的翻新。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一书中提出，对于诗人而言，前代诗作特别是经典作品，不只意味着写作资源和灵感渊藪，更会致其产生创作压力、焦虑和随之而来的误读冲动。借用这一文学批评概念，亦可形容在书籍编刊中出现的“影响焦虑”，即后出版本的编刊者所表现出的对前代经典版本的回应、反抗与突破。随着明中后期以来书籍出版业的飞速发展，书籍数量和类型都呈现出迅猛增长的势头，如何在众多可获取的书籍资源中脱颖而出，成为编刊者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无论是借助经典以标榜自身的权威性，还是打破经典以实现陌生化效应，都成为书籍编刊者们别出机杼的方式。

<sup>①</sup>（清）江峰青：《（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二十五，清光绪十八年刊本。

<sup>②</sup>（宋）陈师道撰：《后山居士诗集》，清雍正三年陈唐活字印本。

#### 四、交叉衍生：文本传承的多样化形态

虽然陈唐试图走出任渊《后山诗注》以来的陈师道诗集范式，但既然想要还原魏衍本的面貌，就不可能绕开与魏衍本关系密切的任渊诗注，因为任渊注诗所依据的文本即魏衍二十卷全集中的六卷诗。

魏衍以陈氏门人身份整理编纂的诗文二十卷，其文本直接来源于陈师道本人的遗稿，但魏衍本被看作陈师道集文本传承之源头的原由不止于此。实际上，据传世文献记载早期陈师道作品的版本是相当丰富的，既有所谓“四明本”号称正与陈师道亲定甲、乙、丙稿合，又有在体量上更为丰富的三十卷临川本、五十五卷谢克家序本。魏衍本经典地位的确立，还得益于魏衍所撰《彭城陈先生集记》作为陈师道集最早编纂成书过程的详细记录，被历代刊行的陈师道集系于书前，而流行后世、影响深远的任渊《后山诗注》以魏衍二十卷本的诗歌部分为底本的这一选择无疑也极大程度地保证了魏衍本在陈师道集流传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因此，陈师道集的全集本系统和诗注本系统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从源头上就具备了相互影响、交叉衍生的可能性。在全集系统诸版本中普遍存在的任渊跋文亦是一证。任渊跋乃为《后山诗注》而做，在《诗注》中一般放在目录开头，而在全集本系统的后出版本中，则往往将任渊跋置于魏衍序、王云跋之后，其目的大概正如任渊将魏衍序置于篇首的目的：“衍字昌世，作后山集记，颇能道其出处，今置之篇首，后有学者，得以览观焉。”<sup>①</sup>

雍正三年陈唐编印的《后山居士诗集》中，前六卷遵循魏衍的旧例，后五卷暨诗余一卷则是“遍搜他本，补所未备”，而当时已经有弘治十二年马嗽刻三十卷本等全集行世，陈唐遍搜他本，应不会遗漏全集本系统中诗歌部分的文本。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明刻《后山先生集》<sup>②</sup>，为赵钊旧藏，有清顾广圻跋并录何焯校跋，傅增湘认为是明弘治马嗽刻本的翻刻本，或即所谓嘉靖本<sup>③</sup>。此书目录、卷端等多处钤有“陈唐印”“陈唐读书记”，且钤于最下位置，自下而上又有“顾广圻印”“赵氏元方”等印，从钤印位置来判断，陈唐钤印的时间应在乾嘉以前，印主也许即是雍正三年编印《后山居士诗集》的陈唐，此《后山先生集》则或为陈唐“遍搜他本”之时曾参看过的全集本系统版本之一部。

同样，全集本编刊校订时也常常借鉴诗注本。如宋蜀刻本《后山居士文集》谢克家序末尾翁方纲（号覃溪）题跋曰：“丙寅九月，覃溪以任注本校看。”再如雍正八年赵骏烈刻《后山先生集》二十四卷，书前有雍正四年王原序及雍正八年赵骏烈自序，其自序称：“虽自愧学殖荒落，见闻孤陋，未能独抒其所得以补任渊之注之所未及，而平日之读诗尚友，其情或可藉一慰也。”<sup>④</sup>即他想要在任渊注诗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但是最终没有实现。王原序文亦提到“后山文集，其门人魏衍辑……任渊注其诗六卷，益为十二卷。今所传马嗽刻本……厘为

<sup>①</sup>〔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目录，第1页。

<sup>②</sup>〔宋〕陈师道撰：《后山先生集》，明刻本。索书号为11173。

<sup>③</sup>傅增湘：《题顾千里临何义门校陈后山集》，《藏园群书题记》，第699页。

<sup>④</sup>〔宋〕陈师道撰：《后山先生集》，清雍正八年赵骏烈刻本。

二十四卷，而任渊之注不传”<sup>①</sup>，亦将任渊《诗注》放在魏衍本和弘治十二年马墩刻全集本之中间环节。

基于上述全集本系统和诗注本系统各版本之间相互借鉴的种种情况，而全集本系统某些版本与诗注本系统某些版本在时间节点上恰到好处的重合度，如均有弘治、嘉靖、雍正间刊行等，使得它们之间产生联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不禁引人猜想，弘治十二年马墩刻《后山先生集》时，在文本细节上参考弘治九年袁宏刊行的《后山诗注》是否比使用早期珍秘之本要更为方便。也许，两个时间相近而分属不同系统的版本之间存在文本影响的可能性，要比同一系统内部却间隔时间较长的版本之间纵向关联的可能性更高。这一版本交叉衍生的文本传承形式正是陈唐编印无注本陈师道诗集的潜在语境。

从文物和文献角度考虑，后出版本的价值往往被认为不及早期珍贵的宋元善本，但在书籍史视域之下，后出版本的编刊过程本身充满耐人寻味的细节，后出诸本汇集而成的版本衍生样态更是不乏可供探寻的意义。以《后山先生集》为代表的全集系统和以《后山诗注》为代表的诗集系统，并非是两个彼此隔绝、独立发展的系统，其后出诸版本之间呈现出一种交叉衍生的紧密关系，共同组成了传世陈师道集的丰富文本资源和多样化形态。

---

<sup>①</sup>（宋）陈师道撰：《后山先生集》，清雍正八年赵骏烈刻本。